

跨國草根移工運動的形成
香港「亞洲移工協調會」案例研究*
夏曉鵬**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s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by Hsiao-Chuan HSIA

關鍵詞：跨國主義、移工運動、草根組織、草工移工運動、亞洲移工協調會

Keywords: transnationalism, migrant movemen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收稿日期：2013年5月1日；通過日期：2014年4月28日

Received: May 1, 2013; in revised form: April 28, 2014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NSC95-2745-H-128-004-HPU)之部分研究成果，前一版本曾以英文發表(Hsia, Hsiao-Chuan. 2009.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s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 (1): 113-141)。感謝鄭維鈞將英文論文譯成中文，成為本文初稿的基礎。

** 服務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通訊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E-mail: hsiahc@cc.shu.edu.tw

摘要

近幾年來，資本主義全球化快速擴張，國際移工的相關學術研究也顯得日形重要。這些研究除了呈現出全球化如何增強勞工遷徙的程度之外，也描述了移工們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劇烈影響。然而，少有研究紀錄移工如何彼此結合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藉由不同國家草根移工組織的連結，移工已經創造出一種由下而上的跨國主義，積極地挑戰資本主義全球化。本文鎖定香港的「亞洲移工協調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分析草根移工組織如何跨越國族的疆界，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

大部分將香港視為「跨國行動主義據點」(site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的研究都忽略了草根移工組織的重要性，以及他們與其他移工NGO組織的區隔。「亞洲移工協調會」之所以特別有趣而重要，因為它不僅是第一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移工的結盟，更是不同亞洲國家的「草根」移工組織的結盟。藉由研究「亞洲移工協調會」，本文分析來自包括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與斯里蘭卡等不同亞洲國家的移工是如何跨越國族、種族和性別的藩籬而一起工作。也將探討「亞洲移工協調會」如何形成？已達成哪些重要成果？是由哪些因素促成？與其它NGO的關係為何？對於草根跨國主義的推展又具有什麼樣的啟示？

Abstract

A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intensified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have gained significance. Studies have shown how global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extent of labor migration and how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globaliza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how migrant workers collectively resist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By collaborating with 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migrant workers have created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vehemently challenging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 in Hong Kong to illustrate how grassroots migrant organizations resist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Most studies of Hong Kong as a “site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overlook the unique importance of grassroots migran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distinctions from migrant NGOs. The AMCB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not onl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coalition of migrants from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because it is a coalition of grassroots migrant organization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By focusing on the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migrant workers from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Thailand, Nepal and Sri Lanka, have worked together across nation-state, racial,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is article asks how AMCB originated; what AMCB has achieved; what makes AMCB possible; and what are the lessons of grassroots transnationalism demonstrated by AMCB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GOS.

一、問題意識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近年來的快速擴張，國際移工的議題又在學術論文中取得重要性。這些研究除了呈現出全球化如何增強勞工流移的程度外，也描述移工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劇烈影響。然而，鮮有研究紀錄移工如何彼此結合以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

少數關注移工行動的學者，關注的是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所付出的努力。Ford (2004)檢視了移工NGO和移工協會(association)的崛起和運作，認為這些由NGO贊助支持的外籍家庭傭工組織不管是在雇用國或其母國都是一種重要的新形式；並且強調移工NGO的組織功能毫無疑問地確立了移工NGO是工人運動的一部分。Sim (2003a)則是表彰NGO在倡議移工相關議題的重要性，並且認為NGO行動的潛能已是有目共睹，並已生產出跨國移工議題論爭中的洞見。

認知NGO在倡議移工權益上的貢獻固然重要，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如Petras (1999)所批判的NGO菁英化、缺乏代表性，以及有意或無意地淪為帝國主義共犯結構的問題。事實上，所謂「政府主導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GOs, GONGOs)以及「黑手黨運作的非政府組織」(mafia operated NGOs, MONGOs)並不罕見。因此，我們當然不能夠認為所有NGO組織的目標都是那麼純正地要保障移工權益或爭取移工福利。

雖然許多移工NGO宣稱他們的目標是要對移工進行「培力」(empowerment)以及保障移工權益，但卻常是為移工「代言」，而所謂的「培力」也不過是華麗的修辭學，並非真實狀況。然而，許多研究並未區分NGO和草根(grassroots)移工組織，而將兩種組織的努力和成果混為一談(例如，Constable 1997; Sim 2003a; Law 2002)，如此一來，便忽視了移工如何自我組織，以及如何發展草根移工運動。儘管NGO能

夠協助與催化草根移工運動的發展，但並非所有的NGO都致力於建立草根運動。我們必須分析移工NGO在處理移工議題上如何定位自己？而這個NGO是以「經紀人」之姿為移工代言嗎？抑或清楚定義自身為移工的「支持者」，並盡其努力發展草根移工組織？

關於移工議題的行動始終具有「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元素。如Parreñas(2001)所指出的，縱然「接受地的脈絡」(context of reception)各有不同，從事家庭幫傭的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流離經驗卻非常類似，使得她們得以類同經驗為基礎，形成跨國聯盟。大部分對於移工的跨國主義研究都聚焦在某一國籍的移工跨越國界來進行組織工作；亦即，在這些研究當中，「跨國」(transnational)意味著「跨國界進行組織」(cross-border organizing)，而非「跨族群的團結」(trans-ethnic solidarity)的那種來自不同國籍成員所形成的移工行動主義(activism)。(Lyon 2009)

研究指出，因為不同國家和仲介之間的競爭，不同國籍的移工通常是分裂而非團結的(Cheng 2003; Lan 2003)。因此，為了保障移工權益，學者呼籲移工要進行跨國的連結(Cheng 2004; Tierney 2002)。然而，鮮少研究探討不同國籍的移工如何能克服仲介和政府的「分而治之」策略，以進行跨國結盟。

如Evans(2000)所言，在全球串連的層次，相關的分析 and 理論一直無法跟上日益進展的實踐。Evans並指出，近來的全球規則和網絡的建立乃是植基在跨國公司的利益，具有其「支配性」(hegemonic)。因此，「由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是「反支配性的」(counter hegemonic)，因為它使得一般平凡百姓得以打造不同的生活，這些在過往侷限於國族疆界的傳統世界中是不可能的。

「由下而上的全球化」漸受矚目(Portes 2000)，尤其是在1999年上萬的抗議群眾造成WTO的西雅圖會議功虧一簣(Brecher et al 2000)之後。然而，大部分的研究聚焦於反WTO、反G8會議、反APEC等等的

「大事件」，且傾向將跨國社會運動視為沒有計畫、自發性的、無組織性的、無政府主義或後現代的，而相關的網絡則被形容為隨意而鬆散的。草根組織夜以繼日按部就班地努力進行串連，試圖超越國界以組織底層群眾的企圖，卻一直被忽略。不像具備資源的NGO和倡議團體，大部分的草根組織沒有資源讓自己獲得全球能見度。此外，草根組織需要做很多基層工作，包括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Freire 1970)、組織和動員，因為草根成員通常缺乏自信、難以取得訊息和資源。

關於跨國社會運動，Porta和Tarrow(2004)指出社會運動跨國化的三個重要過程：散播理念(diffusion)、內部化(domestic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並區分全球行動與國族疆界內的行動，雖然他們同時也看見兩種行動之間的互動。同樣地，Evans(2000: 240)也區分在地性的行動與跨國主義行動：

建立跨國網絡給在地性的組織動員一個成功的新願景，而在地的動員是反支配性全球化的必要因素。

然而，如同Smith(1994: 25)所指出，從跨國移工與難民當中出現的這種草根政治實踐型態，難以用上述慣用的地方與全球的分類來分析他們展現的在地政治(local politics)。草根移工的鬥爭必須要同時面對他們的母國、工作和居住的國家，以及許多超越國家的機構，這種「同時性政治」(politics of simultaneity)會把多重地區的多重行動者聚在一起。同樣地，Law(2002)認為僅僅將香港的移工NGO的跨國倡議在地化，視其為在地政治的當代形式，是不足以掌握其性質的。Law認為應將香港視為一個具有較寬廣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跨國行動「據點」(site)，在那裡有結合移工、女性主義者和工人組織的新聯盟出現。

香港作為一個移工議題的「跨國行動主義據點」(site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已被廣泛研究(Constable 1997; Law 2002; Sim 2003b; Ford 2004)，但多數研究並未強調草根移工組織的重要性，或將他們和移工NGO混為一談。「亞洲移工協調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以下簡稱AMCB)之所以特別有意義而重要，因為它不僅是第一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移工組織的結合，更是來自不同國家的「草根」移工組織的結盟。¹AMCB的草根跨國主義不僅是跨越地理上的國界，更是不同國族／族群的結盟。

部分研究報告已經提及AMCB的重要性(Law 2002; Sim 2003b)，但並未深入分析其成立過程。Law(2002)指出AMCB的成立是源於亞洲金融風暴。然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來自不同國家的許多移工就已經為成立聯盟而努力。如果沒有持續的付出與累積，金融風暴並不會引發AMCB的建立。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我所謂的「行動的方法論」(methodology of activism)。藉由仔細研究AMCB，我要探究：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移工是如何跨越國家、種族和性別的藩籬而共同合作？他們已經達成什麼成果？是什麼因素使這樣的草根移工跨國主義成為可能？從AMCB的草根跨國主義，我們可以學習什麼課題？除了相關的書面和網路資料之外，本研究還進行深入訪談，訪談的對象包括AMCB成員組織的五位領導幹部與五位積極會員，以及兩位協助AMCB成立的NGO組織者，還有三位香港在地社會運動組織的領導幹部。

1 在此之前的聯盟或網絡若非只是由NGO組成，就是混合NGO和草根移工組織，例如「亞洲移工中心」(Asian Migrants Center)主導的「移工權益聯盟」(Coalition of Migrants Rights)。

二、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分化與對立的移工

香港的移工多數為「外籍家庭傭工」(Foreign Domestic Helpers)，且98%的外籍家庭傭工都是女性。至2011年底，香港已經有299,961位外傭(Hong Kong Government 2011)，同年香港總人口為7,071,576(香港統計處 2011)，可見外籍家庭傭工在香港已為顯著的群體。

菲律賓女性傭工曾佔香港外傭的最多數，1997年菲律賓籍人數佔所有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的80%以上。一九九〇年代香港開始引進印尼籍傭工，使印尼籍人口的比例日漸增加，從2001年的29%增加到2005年的43.4%，而菲律賓籍的比例也因此從2001的66.7%降到2005年的52.9%(Hong Kong Government 1997,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至2010年，菲律賓籍外籍家庭傭工佔48%，印尼籍則佔49%(香港入境事務處 2010)，已超越菲律賓籍。除菲律賓與印尼外，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的來源國還包括泰國、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印度等國。

雖然移工面對香港政府規定之相同的勞動條件，但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並不因而自然形成共同體或「社群」的連結感。相反地，許多移工對於其他國籍的移工都存在刻板印象或偏見。

菲律賓移工認為菲律賓人比較好並且受過教育，而其他國籍的移工沒有受什麼教育，所以他們就可以被剝削。尤其是印尼人來自貧窮家庭或鄉村的形象，認為他們並不是準備好來工作，只是來這裡玩玩，因為他們年紀小而且教育程度也低。(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泰國移工不喜歡印尼籍的，因為覺得會被他們廉價的工資所取代。泰國以前是第二大，如今是第三大，他們認為印尼人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拿非常低的工資。他們認為菲律賓移工經常受到性

侵害，因為她們太開放，太前衛了。(泰國區域聯盟主席)

印尼移工會害怕菲律賓人，因為菲律賓人會說英語，而且懂得如何抗爭，所以只有菲律賓人才有資格有較高的工資。(印尼移工協會主席)²

移工對於其他國籍移工的負面印象，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各個發展中國家為了拓展勞動力輸出市場而彼此競爭的脈絡下所建立的。為了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勞動力輸出國通常必須展現他們的「競爭優勢」，亦即，他們國家的勞工是如何比其他國家的更「好」。以菲律賓來說，該國的勞動力輸出政策已有很長歷史，有較完整的輸出體系，競爭利基就在於「技術」，包括說英語的能力。對於那些勞動力輸出政策形成較晚的政府來說，市場利基在於保證勞工比較便宜且乖巧。為了確保勞動力輸出機制暢通，輸出國政府通常不願意保護移工的福利和權利，甚至有些還會主動參與訂定不利移工的契約條件。在某次出國行前說明會中，一位印尼勞動部門官員便對該國即將出外打工的移工說，印尼移工拿比其他國家移工還要低的工資是「正常的」(Sim 2003a)。對這些政府來說的國家「競爭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其實是移工的「競爭劣勢」(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Constable 2010)。當印尼移工遭遇問題時，香港的印尼領事館還勸阻印尼移工對雇主採取法律行動。(Sim 2003a)

在印尼的仲介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們不只訓練印尼移工更為「乖巧」，還強化對其他國籍移工的負面形象。(Sim 2003a)

所有的印尼人都被仲介不斷告誡：別和菲律賓人交朋友。一般移

2 為創會主席，受訪時仍為主席，現已卸任。

工會覺得拿低工資其實還好，因為菲律賓人會說英語，而且懂得如何抗爭，所以只有他們能拿到較高的工資。(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因此，當企圖成立聯盟時，不同國籍移工間彼此的敵視就成為必須克服的障礙，下文將探討AMCB如何成功地克服不同國籍移工之間的裂痕和偏見，以推動移工福祉和權利。

三、亞洲移工協調會的發展

「亞洲移工協調會」(AMCB)於1996年在香港成立，由不同國家的草根移工組織共同結合。直至2013年，它尚未成為一個正式的聯盟，雖然根據聯盟在2003年所做的自我評估報告，向香港政府申請登記為「社團」(society)是未來要完成的任務之一。至2014年二月，AMCB的成員包括：「遠東海外尼泊爾人協會」(Far East Overseas Nepalese Association，簡稱FEONA)、「海外尼泊爾人工會」(Overseas Nepali Workers Union，簡稱ONWU)、「斯里蘭卡人協會」(Association of Sri Lankans，簡稱ASL)、「印尼移工協會」(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簡稱ATKI)、「印尼移工工會」(Indonesian Migrants Workers Union，簡稱IMWU)、「印尼反超收聯盟」(United Indonesians Against Overcharging，簡稱PILAR)、「印尼移工穆斯林聯盟」(Indonesian Migrants Muslim Alliance，簡稱GAMMI)、「泰國區域聯盟」(Thai Regional Alliance，簡稱TRA)、「泰國之友會」(Friends of Thai，簡稱FOT)、「菲律賓團結聯盟」(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全名為UNIFIL-MIGRANTE-HK)以及「菲律賓移工工會」(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簡稱FMWU)。

AMCB的成形乃是1994年及1995年在香港舉辦文化節(Asian Cultural Festival)的結果。這個文化活動提供了一個讓不同國籍的移工

一起合作的機會，在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精神下分享彼此的傳統文化舞蹈與歌曲(APMM 2003)。「第一屆亞洲文化節」(The First Asian Cultural Festival)於1994年10月23日舉行，有包含來自印度、印尼、泰國(泰國婦女會，Thai Women Association，簡稱TWA)、尼泊爾(遠東海外尼泊爾人協會)，以及菲律賓(菲律賓團結聯盟)等國的一千五百位移工參加，當時印度和印尼都還未成立代表移工的正式團體。前述幾個團體，再加上「斯里蘭卡人協會」，共同策畫了同年十二月的「國際人權日」慶祝活動。1995年「國際人權日」舉辦的「亞洲移工節」(Asian Migrant Festival)時，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們再次呈現他們的傳統舞蹈和歌曲。

到了1996年，由菲律賓團結聯盟、遠東海外尼泊爾人協會與「菲律賓移工傳教會」(Mission for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簡稱MFMW)的團體代表組成委員會，起草一份結盟的宣言，之後由各國籍的移工團體代表參與討論。經過一連串的會議之後確立宣言，並且在1996年12月10日配合「國際人權日」所舉辦的「第三屆亞洲移工節」當中宣告正式成立AMCB。參與創立的移工組織包括斯里蘭卡人協會、遠東海外尼泊爾人協會、泰國之友會、印尼團體(非正式的印尼移工組合)、泰國婦女會和菲律賓團結聯盟。

於1994年開始舉辦文化節的原因是，自1980年代初期即開始在香港從事移工組織工作的菲律賓組織，包括菲律賓移工傳教會和亞太菲律賓移工工作團(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 Filipinos，APMMF，後改名為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亞太移工工作團)，其組織者意識到，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在香港有越來越多來自不同的亞洲國家的移工，因此逐漸將服務與組織對象擴大，除原本的非菲律賓籍移工外，也觸及其他國籍的移工。在組織過程中，他們發現不同國籍的移工雖面對類似的處境，卻被「分而治之」，為了促進不同國籍移工間的團結與合作，讓移工運動的力量更強大，他們苦思各種

方法，促成不同國籍的移工間的連結。

不只菲律賓人被剝削，其他國家也在做勞力輸出。香港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大量移工，因此我們必須分享在香港進行移工組織的經驗。為了要確保移工的權利和福利，我們必須同時面對移出國與移入國。意即，我們必須面對香港政府以及其他國家政府，最好是不同國籍的移工能站在一起，使我們的力量更強大。（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

不同國籍的移工在交流時，除了之前提及受「分而治之」統治策略影響而形成對彼此的偏見外，另一客觀的現實障礙為語言的隔閡。英文雖說為國際語言，但許多來自印尼、泰國、斯里蘭卡等地的移工（尤其是家庭傭工），在母國並未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未完成中學教育），因而不識英文。而來自菲律賓、尼泊爾的移工，雖因受美英殖民而較懂英文，但多有濃厚的母國語言口音，溝通並不順暢。

為了突破上述障礙，菲律賓籍組織者尋找富有創意的方式來實現，從文化分享開始，逐漸將其轉化為移工議題的跨國網絡，因而舉辦亞洲文化節。透過戲劇和舞蹈表演的肢體語言，結合了讓人感同身受的音樂，亞洲文化節等文化活動成功地讓不同國籍的移工，突破語言的藩籬，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我們從文化交流開始，……因為許多移工對於展現自己的文化和學習他人的文化有著高度興趣。菲律賓組織會在文化展演中，包括戲劇、舞蹈和音樂，將議題帶入。其他國籍人士覺得這種展演的形態很有趣，因此就來學怎麼做。然後我們就開始，除了準備文化活動外，在活動前後，開始討論議題。在討論中，我們會試著對其他國籍的人拋出議題，看他們如何回應。他們覺得有趣的

話，接著就會針對議題詢問更多的問題。當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比如說調降工資，我們就會問他們說該如何來反制。然後他們決定最好是能夠組織自己，共同並肩戰鬥。（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

AMCB自1996年成立後，工作項目包括倡議與組織、連結與合作，以及教育訓練。每一個成員組織都維持獨立運作；AMCB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由來自每一個成員組織指派的執行委員所組成，他們定期開會策劃行動與活動，例如在國際婦女節、國際勞動節、國際人權日、國際移工日等重要的日子舉辦活動，動員AMCB的成員參與，作為教育訓練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AMCB也與尚未加入聯盟的移工團體保持聯繫並且進行相關討論。2007年11月25日AMCB便在香港舉辦了「第一屆亞洲移工高峰會」(Fir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Summit)，藉以強化和其他移工組織的團結。AMCB和區域性或地方性倡議移工權利和福利的機構維持夥伴關係，並且和在香港的主要工會、婦女和社區組織建立合作關係。為了強化成員們對問題的認識，幫助他們對於自己國家有更深的認識，AMCB經常舉辦教育訓練來分享經驗和鬥爭過程，其他的教育訓練活動包括領導幹部訓練、關鍵議題討論……等等。

四、亞洲移工協調會的成果

(一)建立香港草根移工運動

AMCB的第一項成就便是建立了香港的草根移工運動。在AMCB成立之前，許多移工組織儘管活躍，但通常只能代表某個國家的移工。自從AMCB成立之後，這些相關議題就不再只侷限於特定國籍、種族或性別，因為AMCB是由不同國籍的移工共同組成，包括男性和

女性。

AMCB已經藉由動員他們的成員組織或其他組織，帶領著香港移工進行反對歧視移工的政策。例如，由於尼泊爾建築工人受到歧視，無法擁有和香港本地工人相同的工地安全設備，AMCB聲援尼泊爾工人的抗爭，成為跨越國家、種族和性別藩籬的成功例證。此案例說明AMCB並未因為多數組織成員為女性家庭傭工而只介入與此相關的議題，他們同時也介入男性移工所遭遇的困境。

為突破「分而治之」的統治者策略，AMCB在成立時便非常強調「異中求同」，由各成員組織討論出「團結的基礎」(Basis of Unity)，此基礎為針對影響移工權益的議題和問題進行鬥爭，亦即成員組織把自身定位為移工運動的一部分，而非僅為母國同胞的福利。更重要的是，這個團結的基礎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因為他們理解自身流離遷徙成為國際移工的根源為何。

AMCB的基本認知是所有的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都是母國貧困的受害者。它迫使移工遷徙。從這個基本認知出發，我們結合在地的、全國的與全球的運動。因為瞭解它的根源，移工們容易瞭解我們何以針對香港政府和對母國政府策動議題。(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這個團結的共識促發了更多移工的投入，走上街頭抗議和參與遊行的移工越來越多，在抗議刪減工資的議題上，參與的人數從五千人攀升到一萬兩千人(APMM 2003)。這種大規模動員群眾的能力已經促使香港政府多次改變原有的移工相關政策。

大規模群眾活動和動員的結果，使香港政府正視AMCB為重要的移工權益代表。舉例而言，每年提案的「規定最低工資」(Minimum Allowable Wage)已經成為過去幾年來AMCB的主要行動目標。自從它

成立之後，就成功地發動反對減薪提案的相關活動。1998年八月，亞洲金融危機後，當外籍家庭傭工的雇主協會要求減薪35%時，臨時立法會的委員則提案要求將家庭傭工的法定最低工資減少20%。AMCB立即發動反對降低工資的抗爭活動，帶領兩千名移工在「國際人權日」慶祝活動參與遊行。1999年元月，香港政府把原本20%-35%的減薪方案調降為減薪5%。(APMM 2003)

2001年十一月，香港政府提出「增加歲入方案」，其中包括了一項對於外籍家庭傭工15%-20%的減薪計畫。AMCB召開記者會聲明反對該提議方案，並且於12月2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和政府總部發動集會，³有逾三千名移工參加，迫使教育統籌局(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希望和AMCB在此議題上能夠進行對話。2002年1月13日，有五千多名移工上街反對減薪，而經過了群眾抗爭之後，對於規定最低工資的檢討最終維持原來的金額，而非減薪。經過一連串的抗爭和連署活動，在2002年的2月23日達到最高潮，共有一萬兩千名移工參加了歷史性的大遊行。

因為規定最低工資每年都必須被重新拿出來檢討，AMCB也就持續備戰狀態及組織抗爭行動。2005年，規定最低工資調高了50元港幣；2006年及2007年調高了80元港幣；2008年再調高100元港幣之後(Constable 2007)，2008年7月10日達到3,580元港幣。儘管歷經多次的調升，它仍然低於2003年三月份3,670元港幣的工資水準。因而，要求將規定最低工資回復到原來2003年三月水準的相關活動也就持續進行。2011年六月香港政府終於再調高160元港幣，使最低工資成為3,740港幣，雖已超過2003年減薪前的最低工資，但AMCB對此仍表不滿，因為仍低於1998年的最低工資3,860港幣。此外，近年的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使得最低工資遠不足以滿足香港外籍傭工的基本需求，

3 AMCB是最早發動抗議減薪的移工組織，之後，其他的組織也發動抗議。

因此AMCB仍持續提高工資的運動，主張提高最低工資至4000港幣。
(Aning 2011)

與最低工資相關的議題是香港政府自2003年十月分起開始針對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每月課徵400元港幣的政策。但早在2001年七月，香港勞工處便曾提案針對雇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課徵400元港幣作為對想從事家庭幫傭工作的本地勞工進行再訓練計畫的經費(所謂的「菲傭稅」)。AMCB立即提出反對，而勞工處也撤回它的課稅提案。而就在宣佈此政策之前數月，香港政府於同年四月將外籍家庭傭工每月減薪400元，理由是要減輕僱主的負擔。AMCB持續要求取消對僱主的徵稅，⁴以及提高外籍家庭傭工的薪資，因為對僱主徵稅是剝削外籍家庭傭工，讓政府獲利，而對僱主毫無幫助(少付工資400元，卻要多付稅金400元)。

雖然AMCB的抗爭活動和移工政策之間並無單純的因果關係，他們也不是提出倡議或發動抗議的唯一團體，但AMCB強大的群眾動員能力，即便是在當地主要的勞工組織看來，都認為具有絕對關鍵性。

香港職工聯盟的秘書長也同時具備議員身分，會把移工議題帶入立法會向政府施壓。但移工的群眾動員帶給政府的是更大的壓力。(香港職工會聯盟總幹事)

(二)建立香港社運組織與移工草根組織的連結

AMCB和工會、婦女團體及香港的社區組織建立多樣性的關係，這些連結都有助於AMCB所發動的抗爭。為了確保和香港當地組織的團結合作，除了出席並參與當地的活動之外，AMCB也組織了團結行

4 其他移工組織贊成這項課稅，菲律賓團結聯盟曾發表聲明反對這樣地立場，詳見 http://www.apmigrants.org/jsmallfib_top/Papers/UNIFIL%20Critique%20of%20CMR%20Stand%20on%20the%20HK%20Levy%202005.pdf

動來聲援香港本地人民所遭遇的議題和困境。例如，AMCB聲援了反對針對僱主課稅以及支援當地家庭傭工爭取最低工資的活動，強化了香港當地組織與移工組織間的團結。2013年3月28日開始的香港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議首富李嘉誠手下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公司過去十五年來未漲工資，AMCB亦動員會員組織前往聲援，除參與4月7日由香港各界組織發起的市區遊行外，數十位組織幹部於4月4日前往罷工線與碼頭工人致上團結之意，並分享AMCB爭取調高最低工資的運動經驗。⁵

除聲援外，AMCB更進一步發掘與香港在地組織連結的基礎。舉例而言，1999年，一些反移工的政策建議被提出，包括禁止外籍家庭傭工擔任駕駛工作、廢除懷孕保護和外宿規定。AMCB的各會員組織為此召開一連串的會議，並且也加入家庭傭工和雇主的協調會議。反對政府提案廢除對外籍家庭傭工的孕產福利所發動的抗議行動，便得到婦女團體的聲援，因為該項提案侵害的不僅是女性移工作為工人應有的權利，也侵害了她們作為女人應有的權利。此次反對各項禁令的陳情號召了數千人連署，透過與在地組織的有效連結，這三項提案於是2000年遭到擱置。

一如不同國家移工之間互有偏見，香港當地人士對移工們也有偏見與歧視。但透過AMCB聲援本地組織的行動，許多香港在地的團體漸漸將移工團體視為朋友。例如，香港本地家務助理工會的領導幹部對於其爭取最低工資保障的運動能夠獲得移工們的聲援，在受訪時都展現了感激之情。而移工組織過去只關注和自己母國相關的議題，藉由AMCB的運作，他們對於香港在地的議題也付出了更多關注與行動，瞭解到他們必須克服彼此間的藩籬，並且和當地組織共同合作。就像印尼移工協會主席所指出：「要獲得當地支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積

5 AMCB和成員組織參與遊行的畫面可參見：<https://www.engagemedia.org/Members/narcissan/videos/in-the-name-of-righteous-human/view>

極介入在地活動，……展現我們是來此聲援的。」

自成立以來，AMCB與香港在地組織的連結日漸增加，但多為零星而隨機的，並未形成更系統而有機的組織性合作。直到2005年人民反抗WTO的大集結，成為強化AMCB和香港在地運動組織間團結的重要轉捩點。

2005年的第六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時，遭逢了監督WTO人士所組織而成的「民間監察世貿聯盟」(Hong Kong Peoples Alliance，簡稱HKPA)所籌畫的「人民行動週」(People's Action Week)。AMCB加入了該聯盟，並且是工作委員會七個成員組織的成員之一。在反對WTO的遊行當中，AMCB動員了超過一百名移工，與香港本地社運人士共同組成糾察隊，維持隊伍秩序。此外，AMCB積極地籌辦各種論壇、遊行，讓移工議題獲得更多的關注。根據參與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決策核心的香港職工盟總幹事的說法，在2005年反對WTO的抗爭活動過後，香港社運界對於AMCB簡直刮目相看。

本地組織對於AMCB的組織動員能力都感到印象深刻。AMCB對於WTO所帶給一般老百姓生活的衝擊瞭解透徹，那是香港民眾所不清楚的，因此也打開了本地人的眼界。我們聯盟的幹部說我們應該像移工們一樣。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組織和表達的方式。他們的集會非常的活潑且富有創意。

(三)建立香港草根移工運動的國際連結

2005年反WTO的抗爭行動對於AMCB連結上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全球運動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在反WTO的人民行動週第一天就動員超過五千名移工參與主要的大遊行活動，使AMCB向全球展現出領導移工運動的堅強戰力。⁶

6 這些參與反WTO抗議行動以及之前所述的各種活動的參與人數，皆是根據AMCB會

反WTO運動大集結於香港，是偶發(contingent)的歷史因素，因為那取決於世界貿易組織。而AMCB之所以能夠善用偶發的條件，創造出更大的運動格局，其必要條件為在此之前，歷經多年的草根移工組織的培力，使他們具備為自己發聲、與其他國籍和組織團結與連結的視野與能力。

在2005年反WTO之前，AMCB便已建立與香港之外的區域性和國際性網絡的連結，而這些連結是一些移工NGO在過去刻意協助AMCB與外界連結的具體成果，從而促使AMCB日漸發展出自身的網絡，同時也加速了它的國際串連，進而壯大了全球性的運動。

建立區域性和國際性連結的最佳場域為各種相關議題的國際會議。然而，絕大多數會議的與會者為掌握訊息和資源的NGO，他們往往成了移工的代言人。為打破此種由NGO壟斷移工議題發言權的情況，⁷亞太移工工作團、菲律賓移工傳教會等以培力移工草根組織為目的之NGO便掌握各種機會，推薦和邀請草根移工組織參與各種會議。舉例來說，2001年8月30日至9月5日於南非德班(Durban)所舉行的「反種族主義與歧視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協助AMCB展開國際接觸。藉由亞太移工工作團與菲律賓團結聯盟的參與，AMCB得以在該場合有代表發言。AMCB的代

員組織及其夥伴團隊所清點的人數，其他移工組織所動員而來的並不包括在內。AMCB強調必須以聯盟團體清點的人數為依據，以清楚掌握組織扎根成果和動員的能量，避免自我感覺良好，誤判形勢。

7 此種狀況，至今存在，成為AMCB、國際移民／工聯盟等強調草根移民／工運動的組織必須不斷面對和突破的困難。例如，許多超國家組織，如聯合國，和由各國政府針對移民／工議題組成的「遷移與發展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GFMD)，為顯示民主原則，往往舉辦市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的各種會議，以代表「市民社會」的聲音，然而這些會議常由與官方和超國家組織關係密切的NGO掌控，運用各種技術手段阻擋草根移工組織的參與，使得AMCB、國際移民／工聯盟等草根組織的聯盟往往必須舉辦會外會，一方面發出自己的聲音，一方面作為對官方會議和NGO代言會議的抗議。關於GFMD以及國際移民／工聯盟舉辦的會外會，可參考(Rodriguez 2010)。

表也出席了2001年在馬尼拉舉行的「國際移工會議」(International Migrant Conference)，在那次會議通過了成立「國際移民／工聯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簡稱IMA)的決議。大部分AMCB的與會代表都是「國際推動小組」(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Committee)的成員，負責落實成立國際移民／工聯盟的決議。AMCB出席了國際移工會議之後，接著參與由「亞太婦女法律與發展論壇」(Asia Pacific Women Forum on Law and Development，APWLD)和「移工國際」(Migrante-International)所組織的關於工會、移工組織和婦女團體的三邊會議，因而建立起與亞太地區婦女團體和機構間的新連結。⁸

2008年的7月14日至17日國際移／民工聯盟在香港舉行了成立大會，成為歷史上的重要一刻，因為它是第一個結合全球草根移民／工組織的聯盟。誠如會員大會的開幕影片所表達的，成立「國際移民／工聯盟」的啟示與意義在於：「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由別人來為我們發聲，而如今我們要自己來發聲。」⁹國際移民／工聯盟的第一任主席是印尼移工協會主席兼AMCB發言人的Eni Lestari女士，她能當選國際移民／工聯盟主席也表示了AMCB的成果受到肯定。

如同香港職工盟總幹事所察覺到的，AMCB的成員們對於WTO相關問題有深刻的批判力。這種批判力乃是受過不計其數的教育訓練方能達成。為了積極參與2005年的反世貿運動，AMCB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接受亞太移工工作團與其他機構的協助，讓移工們瞭解WTO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它對移工所造成的衝擊。例如，亞太移工工作團、AMCB，與「亞太農藥行動網」(Pesticide Action Network-Asia Pacific，簡稱PAN AP)所舉辦的「糧食主權人民營」(People's Caravan for Food Sovereignty)活動結合，舉辦一個關於WTO議題與移工關係的論壇。作為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一員，AMCB積極號召移工反對WTO，利用

8 APMM (2003)。

9 影片請見 <http://internationalmigrants.org/cms/campaign/our-cultural-opening>

幾個禮拜的時間透過「移工十週倒數計時」(Migrants' 10-Week Countdown)，以深入淺出，並緊密扣連移工處境的各種教材進行的教育訓練和相關會議議程，集中火力持續到「人民行動週」。除了本身舉辦的活動，AMCB也積極參與由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所組織的活動。¹⁰

AMCB的發展歷程可總結如下：從一個文化分享網絡轉化為專攻移工議題的單一社會部門的運動(sectoral movement)，進而成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的積極成員。這樣的轉化鼓舞了其他國家的移工組織。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就指出，在南韓的移工組織正努力要成立一個類似AMCB的聯盟；在日本，不同國籍的移工們也嘗試組織文化交流活動。AMCB對台灣的移工草根組織亦有影響。2012年12月23日，由菲律賓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International, Taiwan Chapter)¹¹和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協會(ATKI-Taiwan)¹²首次聯合主辦了慶祝國際移民／工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的活動，亦學習AMCB經驗，藉由文化行動分享各在台灣的各國籍移工的處境和抗爭；這項活動在台灣的移工運動具有歷史性意義，因為是由不同國籍之移工草根組織自主籌辦，企圖促成在台灣的草根移工組織的跨國聯盟。2013年，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和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協會再次連手舉辦論壇，慶祝國際移民／工日，並籌備往後的聯合活動與行動。2014年，亞太移工工作團與台灣的草根移民工組織(包括上述菲律賓和印尼移工組織，以及南洋台灣姊妹會)，以及支持移民工議題的機構和組織(包括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合作一項

10 APMM (2005)。

11 Migrante-International (移工國際)為各國的菲律賓移工草根組織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AMCB成員組織之一的菲律賓團體聯盟為其在香港的組織，Migrante-International-Taiwan為其在台灣的組織。關於台灣分會的組織發展可參見吳佳臻(2007)。

12 香港的印尼移工協會(ATKI)近年來積極促成了澳門和雅加達ATKI的成立，在台灣的ATKI為亞太移工工作團於2009年派印尼籍的工作人員來台灣進行調查和初步組織工作而促成，ATKI成立後與香港和雅加達ATKI常有聯繫。

「搭建橋樑」(Building Bridges)計畫，在一系列的寫作和戲劇工作坊後，於六月十五日舉辦「亞洲文化節」(Asian Cultural Festival)，以文化形式促進不同國籍移民工間的理解與合作。

(四)移工的主體化

對草根運動而言，運動關注的不只是法律政策等外在條件的轉變，更重要的是，作為運動主體的人，在運動過程中的培力與轉化，即Alain Touraine(1988)所說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

對許多移工來說，參與AMCB也是個人轉變的過程。首先，藉由參與AMCB，不同國籍移工間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得到了顯著的翻轉。

以前泰國移工對印尼移工的印象不好，但是因為AMCB的關係，泰國移工已經知道要如何去理解印尼移工的處境。泰國移工如今甚至想要幫助印尼移工。(泰國區域聯盟主席)

直到我住在「香港外傭之家」(Bethune House，由菲律賓移工傳教會設置的移工庇護所)才發現菲律賓人之所以比較進步和勇敢乃是因為他們有組織抗爭運動，而且是由移工自己所領導的。如今很多一般的印尼移工想的和我過去想的一樣。但我們試圖組織他們，給他們信心，讓他們瞭解到問題不在菲律賓人或印尼人。問題在於我們被當成商品，他們認為我們印尼人比較聽話。但我們為什麼會比較聽話？這是因為我們害怕失去工作。(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因為菲律賓人減少而印尼人增加，一般菲律賓移工都認為問題在於印尼移工拿較低的薪資。……但是自從加入AMCB之後，菲律賓人甚至從印尼人身上獲得一些鼓舞，因為他們比較年輕而且有

活力。印尼人總是積極參與集會遊行，而且非常有創意。現在菲律賓人甚至說：「我們應該要更像印尼人才對！」。（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前述AMCB成立後各種具體移工勞動條的改變，皆讓移工體認跨國團結的力量，證明自己是可以做出一些改變的。曾是移工庇護所個案，如今被選為國際移民／工聯盟的首任主席的印尼移工協會的主席感性地總結了草根組織培力的意義：「從受害者變成他們自己的英雄！」

她談到了自己加入移工運動之後的改變：

以前我根本沒想到過什麼抗爭運動，但現在我知道我們是移工運動的一環。……當時我辛苦工作卻得不到應有的工資，就想說只能這樣了吧！即使我不高興又能如何？我只能學習如何當一名「乖巧」的外籍傭工，那指的就是一切服從。但我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我逃開了，然後就發生後續的這些事情。……從這次經驗，我明白了改變必須從移工自己開始。……AMCB所帶給我最大的衝擊就是意識覺醒和介入行動，並且瞭解到保護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戰鬥。

AMCB不僅對過去未曾有過組織與運動經驗的印尼移工協會主席而言深具意義，對一些在母國已有組織經驗的菲律賓移工來說，參與AMCB運作也是對自己進行培力。

我過去參與過學運，但是組織移工複雜度更高。尤其是當我擔任移工組織的領導人，必須對於自己的發言有更多思考，尤其是面對媒體的時候。我學習到了很多，也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一個更全

面性的組織工作者。我還需要再學習如何和其他人，尤其是其它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一起工作。(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AMCB的會員們高度肯定跨國主義的價值，而他們對跨國主義和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認識並非只是理論與抽象的學習，而是源於具體實踐的經驗和成果。

因為AMCB的關係，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和更大的力量去捍衛移工的權利。如果是小團體，我們就不能做那麼多。若是一塊兒工作，比較容易達成目標。(斯里蘭卡協會幹部)

我們是移工運動的一環，……我們不能只有個別國籍單獨進行運動，儘管我們也認知到各國的組織和群體有其內部特有的動力。……所有印尼移工協會的成員都感受到AMCB的團結力量。看到其他國家移工的聲援，讓我們受到了莫大的鼓勵。(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歷史悠久或經驗老到的菲律賓移工組織幹部，也同樣讚許這樣的跨國主義。

菲律賓團結聯盟對AMCB感到非常驕傲，因為移工們更進一步地被組織了。他們很高興看到其他國籍的移工也能夠自我組織，許多菲律賓團結聯盟之外的菲律賓組織也想加入AMCB。(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這種跨國主義趨勢不僅只有核心幹部們感受得到，更普遍存在於AMCB的一般會員之間。

我很喜歡參與AMCB，因為我們可以從彼此學習到很多。例如我們印尼人就能從菲律賓人身上學到如何為自己的權益來戰鬥。我們也學到了許多教育人民和組織群眾的方法。(印尼移工協會會員)

不同國籍的草根移工組織間的相互學習是AMCB建立的重要組織文化。例如，菲律賓組織一方面學習印尼和泰國組織在抗議行動的熱情和創意，另一方面將其累積多年的草根組織方法分享給其他較無經驗的移工組織。此外，為了突破語言隔閡，菲律賓移工組織會提供印尼、泰國等不諳英文的移工英文培訓，而英文對AMCB成員而言只是溝通工具，並不在乎發音、拼字、文法等制式要求，必要時還會搭配肢體語言，他們笑稱這是「AMCB English」。如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所言，「我們決定彼此學習，並且發展出屬於AMCB獨有的文化」。

五、香港的「接受地脈絡」

AMCB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最主要兩個原因為：香港的「接受地脈絡」(context of reception)(Parreña 2001)，以及菲律賓移工運動的影響。誠如Constable(2009)所論述的，香港之所以能夠接受移工抗爭的最主要原因在於1997年後的後殖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本身的特殊性，它宣稱要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以及長期發展成為「新自由主義特例空間」(space of neoliberal exception)(Ong 2006)。然而，它不僅僅受到1997後的氛圍影響，甚至在殖民時代，尤其是1967年大暴動之後，英國殖民政府便已採取了比較自由開放的治理方式，將香港建構為一個在社會與政治皆安定的「現代城市」形象(羅永生 2007)。而香港在此歷史脈絡所營造的「現代的」與「全球的」城市形象，恰恰提供了移工組織工作相對較大的空間。

首先，作為一個「全球的」、「現代的」國際城市，香港給予非香港公民成立團體，包括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更多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使得許多區域和國際組織在香港設置辦公室。除了因英國殖民而使英文成為公私部門通用的語文外，非香港公民成立社團的門檻非常低，即使是外籍家庭傭工的組織也能容易地取得社團登記許可。¹³此外，香港的許多機構和組織為區域性或國際組織的成員，常有各種國際合作的計畫，且可因這些計畫而申請外籍工作者駐香港的工作簽證，而這些外籍工作者居住滿七年後便可申請為香港居民，與公民享有幾乎同等的權利。

最早投入香港的移工組織者為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主任Cynthia，她於1981年首次到香港進行菲律賓移工處境的調查，這個調查計畫源起於香港的教會發現有愈來愈多的菲律賓移工在香港工作面臨問題向教會救助，但教會卻不瞭解他們的處境，也不知該如何協助，因此透過教會的國際網絡尋求菲律賓教會的協助。調查結束後，香港的教會接受了提案，設置服務菲律賓移工的計畫，並聘請菲律賓教會推薦的工作者，他們隨後成立了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並成為菲律賓草根移工運動在香港萌芽的重要推手。¹⁴這些能在香港取得工作簽證，甚至成為香港居民的工作者，是草根組織工作能持續進行，並得以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對地，台灣對非公民成立社團（外籍勞工的組織根本無法在台灣立案），以及非營利組織聘請外籍工作者的限制非常高（例如，薪資必須超過台幣四萬），使得在台灣的草根移工組織的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亞太移工工作團 2002）

第二，不像台灣和其他國家制定移工居留的最高年限，香港的移工可以連續申請為期兩年的簽證和工作契約。儘管外籍家庭傭工並不

13 備齊簡單的文件，向警務處申請註冊即可，文件備妥者，十二小時內即可獲得許可。詳情見http://www.police.gov.hk/ppp_tc/13_faqs/faq_so.html

14 此過程將另有文章詳述和分析。

能申請永久居留權，但在實際操作上，香港這種無居留年限的環境使得移工的組織工作較容易維持和鞏固，移工的領導幹部因而較有條件逐步歷練成為組織者，不用太過擔心被遣返的問題。（亞太移工工作團2002）

第三，打從一開始引進外籍家庭傭工，香港政府為了避免招致本地勞工的抱怨，便在政策上使外籍家庭傭工的聘雇帶點「特權」的意味，包括雇主必須夠有錢（有雇主收入標準）、能夠支付機票費用、提供私人的居住空間、給付得起最低工資，以及要給予完整二十四小時的休假，這些都明訂在標準化契約中，違約的雇主將受罰。例行性的休假對於組織工作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的移工能在週日聚會，使得他們有許多機會接觸各種活動而開始意識覺醒與組織的過程，而這項受保障的休假在台灣和其他主要的外籍家庭傭工接受國並不存在。¹⁵

第四，香港殖民政府和1997年以後的中國政府對於抗議活動都是相對包容的。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主任回憶，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只要抗爭者不反對香港政府，警察通常不會介入，只要行動是和平的，移工向香港政府的抗爭也沒有遭遇警方太多的反制，¹⁶而現況亦如此。

除了上述香港被建構為一個現代與全球城市的形象之外，香港對於移工實際上的需求，尤其在香港的眾多外商、外僑等對於外籍家庭傭工的需求，使得香港成為亞洲最早大規模引進移工（尤其是家庭傭

15 新加坡最新政策是2013年1月1日之後獲發工作證或延簽約的外籍家庭傭工可有每週一天的休假的保障，但雇主可以用加班費方式取代讓移工休假，引起許多移工權益組織的關注，實際狀況如何，仍有待觀察。

16 針對抗爭行動還是存在許多限制。一些香港本地的社會運動者喜歡衝撞這些法令，例如刻意不申請集會遊行許可，但移工組織會依規定申請許可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且和警方維持友好關係，以確保移工不會因為抗爭而被解雇和遣返。

工)的地區之一，¹⁷也使香港政府對於移工的需要採取較為寬鬆開放的態度。

然而，不論香港對移工的接受態度有多麼自由開放，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運動來施壓，移工的生存條件並不會自動改善。當地香港人的社會運動對於移工的運動沒什麼太大的幫助，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主任回憶說，當他們在1981年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儘管可以在教會機構和一些個別人士的支持下成立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但來自於當地民間組織的支持非常有限。

香港職工盟總幹事也回憶說，在剛開始的時候，工會還反對引進移工；1987年他們投票否決允許移工團體加入工會論壇的建議案。¹⁸職工盟最終在1995年接受移工的工會成為會員，因為這些本地工會幹部意識到移工們已經自我組織，而本地工會無權否認移工加入工會的權利。

研究指出，隨著1980年代以來政治結構的開放，以及社運領導人投入選舉政治，香港本地的社會運動日漸衰退，傳統壓力團體政治和社區運動之間的連結逐漸式微(Ho 2000)。因此，香港移工運動的重大進展，尤其是作為先鋒的菲律賓移工運動，相當程度的是依靠移工組織本身持續不斷的努力而達成，再加上前面提及的香港政府相對自由的治理環境，使得香港成為草根移工運動在亞洲萌芽的最早基地。

六、菲律賓移工運動的影響

如前所述，在香港的菲律賓移工的組織工作始於1981年，當菲律賓移工傳教會成立時。作為先鋒的菲律賓移工運動對其他國籍移工組織有重要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AMCB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組織幹部

17 也因而促成菲律賓移工傳教會早在1981年便成立。

18 職工盟當時尚未成立，是有一個教育中心，作為不同工會之間的平台。

在訪談時都表示自己受到菲律賓組織的激勵和協助。而菲律賓籍幹部和組織者則一致強調國際團結的重要性，不因其運動的先進性而自傲和排外。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說道：

我們知道菲律賓組織遠遠走在其他國家之前，但我們不把它當作是一種優勢。我們不把其他國家的移工看成是競爭對手。我們成立AMCB就是要展現我們不應該彼此爭鬥，而應該要彼此幫助。

因為這些菲律賓籍組織者非常清楚「分而治之」是統治者慣用的技倆，因而樂於分享組織和運動的經驗。如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所言：

我們必須分享在香港進行移工組織的經驗。為了要確保移工的權利和福利……最好是不同國籍的移工站能在一起，使我們的力量更強大。

然而，並非所有的菲律賓籍移工都能立即意識到與其他國籍移工合作的重要性，因此菲律賓籍組織者必須相當有意識地努力向菲律賓移工傳達國際團結的重要性。

我們不希望菲律賓人如政府所願地與其他國籍的移工分化和對立。我們需告訴菲律賓移工，要和其他國籍人士共同團結，摒棄競爭心態。我們一方面盡力解釋給菲律賓移工聽，另一方面也向其他國籍移工伸出雙手。（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

此過程並非毫無困難，但菲律賓籍組織者運用各種方法突破困境。

當我們向一般菲律賓移工解釋的時候，有一些會接受我們的看法，但有一些則保持懷疑。所以我們就要透過非正式和正式的討論來試圖教育他們團結的重要性。舉例來說，當我們受邀出席其他國籍的活動的時候，我們會跟他們解釋為何有必要出席此次活動，以及我們應該抱持何種態度。現在，有一些菲律賓移工已瞭解到其他國籍的移工受到的剝削甚至比菲律賓人還嚴重，因此對他們就更有同情心，甚至想要幫助他們。他們感謝當菲律賓人在發起某一個議題的時候能夠獲得其他國籍人士的幫忙，因此也想回過頭來幫助其他國籍的人。(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

為了開啟與其他國籍移工組織的連結，菲律賓籍組織者尋找富有創意的方式來實現，結合了其他國籍移工團體，舉辦前述之亞洲文化節，從文化分享開始，促成AMCB的成立。這種團結其他國籍移工的創意方式打破了語言和文化的藩籬，一位積極的印尼外勞協會會員就指出：

菲律賓人透過劇場表演把他們遭遇的問題呈現出來，儘管我們語言不一樣，還是可以容易瞭解。從他們的表演中，我們也發現彼此的處境很類似。我們也學到了如何透過文化展演來呈現我們的議題。

(一)建立支援機制培力其他國籍草根移工組織

除了運作AMCB之外，菲律賓組織對於其他國家草根移工組織的壯大有重要貢獻。印尼移工協會主席Eni以自身的故事清楚說明菲律賓組織不僅協助她本人，也協助印尼移工協會的成立與發展。

我的工資被雇主苛扣，……忍受這樣的工作大約六個半月，因此

沒辦法償還仲介費。然後，我發現自己真的無法再待下去了。最後我打聽到「香港外傭之家」(Bethune House)並且住到那裏面去。在那個庇護所，我們學了很多，他們教導我該如何處理自己所碰到的事。……他們在香港外傭之家處理事情的方式非常具有培力效果。香港外傭之家透過教育，列舉各式各樣案例的處理方式來協助我自己做決定。菲律賓移工傳教會提供教育訓練並且幫助我認識組織移工的重要性。亞太移工工作團也用許多不同的訓練方法來幫助我。香港外傭之家是許多印尼人的第二個家，同時也是獲得培力的地方。我在香港外傭之家待了四、五個月。在庇護所內，我從菲律賓的抗爭運動經驗學習。我參加他們的論壇、活動，並且對他們的移工組織印象深刻。他們也是移工，但那不會阻礙他們戰鬥或進行組織。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從受害者變成他們自己的英雄，所以我們印尼人也覺得有為同胞成立組織的必要。

四個菲律賓組織的合作網絡對印尼移工協會的發展具有關鍵影響。這四個組織分別是菲律賓移工傳教會、香港外傭之家、亞太移工工作團，以及菲律賓團結聯盟。前面三個都是NGO，建構出以支援移工自主成立草根組織為目標的鐵三角。等到移工草根組織成立後，這三個NGO會尊重其獨立運作，只有在他們提出需要時才會介入幫忙。菲律賓團結聯盟就是以此鐵三角支援網絡的模式創造出來的結果，不久之後，它也成為這個協助其他國籍草根移工組織的支援機制之一部分。

菲律賓移工傳教會是隸屬於基督教會的NGO，為香港第一個為爭取移工福利成立的NGO，一開始主要是協助菲律賓籍的家庭傭工，後來也協助其他國籍的移工。菲律賓移工傳教會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設立了庇護所——香港外傭之家，目前已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提供住宿、諮詢、法律及醫療服務給受創的外籍女工。自從菲律賓移工傳

教會成立以來至2008年訪談時，已經服務了超過兩萬三千個個案，其中有8-10%的工人變得熱衷組織工作。除了個案諮詢之外，教會也教育移工們能夠瞭解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根源，並且一起來找出解決方法。

和過去那種專為案主解決問題的諮詢模式不同，菲律賓移工傳教會向移工提供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選項，最終由移工自己做出抉擇，如此有助於移工學習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而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思考後的決定，對移工來說就是重要的培力。此外，在等待問題被解決的過程中，菲律賓移工傳教會鼓勵移工在組織裡擔任志工，當中許多人因此成了組織的會員。菲律賓移工傳教會除了鼓勵移工參與各項爭取移工權利的活動之外，也提供訓練，包括傳授處理會員個案問題的方法，來協助壯大這些組織。

大部分尋求協助的移工在問題處理完後就會離開菲律賓移工傳教會。而在香港外傭之家，由於移工會在這個庇護所待上一段時間，有更多進行培力工作的條件。就像印尼移工協會主席所指出：「當印尼移工協會在200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時一共有二十四個會員，而其中有一半之前都是香港外傭之家的案主。」¹⁹亞太移工工作團對那些在庇護所內的移工提供訓練，課程包括了領導能力、組織運作、文書寫作（可以用在通訊刊物或聲明稿等等）、公開演說、倡議、結盟工作……等等。當印尼移工協會的創會成員住在庇護所的時候，亞太移工工作團提供了長達三至四個月的每週訓練。而印尼移工協會成立初期，亞太移工工作團仍舊繼續提供例行訓練，直到印尼移工協會的成員具備較為豐富的經驗為止。之後，印尼移工協會獨立運作，僅有在需要旁人意見或協助時才會諮詢亞太移工工作團。

19 在此之前，菲律賓組織者就曾用此方式培力了一些印尼移工，她們便是1996年參與AMCB創立的非正式印尼移工組合。後來這些印尼移工因各種原因離開香港，未形成正式組織。但菲律賓組織者並未放棄，繼續培力新一批在外傭之家的印尼移工，終於促成印尼移工協會的成立。

當其他國籍移工向菲律賓移工傳教會與外傭之家尋求協助時，菲律賓籍的組織者通常會邀請他們參加由菲律賓團結聯盟或其他菲律賓組織所籌畫的活動。活動結束後，菲律賓籍組織者會詢問其他國籍的移工是否遭遇相似的問題，當移工們逐漸瞭解問題的根源，菲律賓籍組織者再進一步詢問他們想要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如解放教育學者 Paulo Freire (1970) 所說的「提問法」(problem-posing method)，在菲律賓籍組織者協助其他國籍移工意識化 (conscientization, *ibid*) 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我們對他們的狀況，尤其是他們所來自的國家，所知不多，所以鼓勵他們去找到他們自己的問題，然後去找到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尋找問題根源的過程就是一種培力。不久之後，他們會受到更大的培力來決定該做些什麼把問題解決掉。(菲律賓移工傳教會主任)

菲律賓草根移工組織對其他國籍移工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鼓舞力量。菲律賓團結聯盟是結合菲律賓草根移工組織的聯盟，擁有超過五千名會員，所有人都是家庭雇傭，而其中95%是女性。這些組織在1985年五月成立了菲律賓團結聯盟，他們在之前因抗議馬可士政權的強迫匯款政策²⁰而結集。至2014年二月，菲律賓團結聯盟由33個組織所組成，其中包括了宗教、文化和聯誼性團體。受到菲律賓團結聯盟

20 1982年，馬可仕總統頒定第八五七號命令 (Executive Order No. 857, EO-857)，通稱為「強迫匯款」(forced remittance)，要求菲律賓的海外契約工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OCW) 將總收入的50%-70%匯回菲律賓 (比例視其工作分類而不同，工作類型包括：海員、專業者、建築工、及家庭幫傭)。這個法令也禁止使用非銀行的管道，並規定移工只能透過政府特定的銀行匯款。無法提供滿足上述比例的匯款證明的海外契約工將受懲治，如失去續約、解約、護照延期……的權利，或從有資格到海外工作者的名單中排除。由於移工在接受國花費占薪資比例相當高，如此高的匯款對他們而言非常困難。為了避免受罰，移工被迫借貸，以及透過指定銀行匯款。

的鼓舞，印尼移工協會也和其他的印尼移工組織結合成立了兩個聯盟：「印尼反超收聯盟」(United Indonesians Against Overcharging，簡稱PILAR)和「印尼移工穆斯林聯盟」(Indonesian Migrants Muslim Alliance，簡稱GAMMI)，都成功地在香港動員印尼移工，並且施壓印尼政府回應她們的需求。

菲律賓籍組織者也是印尼移工協會和其他團體的友好夥伴，當他們遇到問題時便協助共商對策。對於沒有組織與動員經驗的印尼移工來說，這樣的陪伴和討論非常重要。印尼移工協會的主席活靈活現地回憶協會成立之初，菲律賓籍的組織者是如何協助她們解決問題。

當我們開始進行組織的時候，我才清楚有多少印尼移工心懷恐懼，當上幹部就像見光死一樣！在2000年和2001年剛開始的時候，連去維多利亞公園都不安全，因為仲介和印尼領事館的人員都在監視移工。所以我們決定搬到九龍的天星碼頭，但也沒有用。因為如果我們沒辦法進去印尼移工聚集最多的公園，要如何進行組織工作？到了2001年，在諮詢過菲律賓籍組織者之後，我們針對印尼移工的勞動條件展開調查。這是進行組織的開啟點。調查過程中我們一方面瞭解印尼移工最關切的問題，也藉此接觸他們，開始一些討論。我們第一次的抗議行動就是在領事館前說出訴求的議題並突破恐懼，我們那時甚至都還必須帶著黑色面具，移工才不會被仲介或政府的人指認出來。這個抗議活動在週間進行，不到一百個人前來參加。但那已經有相當重大意義，並躍上新聞版面。所以我們得到信心，繼續待在維多利亞公園。外傭之家的Edwina整整一個月每個禮拜都從香港外傭之家來陪我們，因為我們不知如何面對騷擾和恐嚇。她從旁協助我們，而我們也學會如何處理這一類的事。不久之後，我們能夠自己處理，她就不用再陪我們了。

(二) 批判 NGO 主義且強調草根組織

如同在其團結宣言所清楚陳述的，AMCB 堅信強而有力的群眾運動是解決移工困境的唯一方法。

我們相信，只有透過按部就班的扎根組織工作 (step-by-step organizing)，對我們的同儕進行教育，把我們自己投入值得付出的群眾行動，我們才能正視對家鄉的思念，並確保我們的權利、福利與尊嚴。

「按部就班的扎根組織工作」由菲律賓的組織發展出來，並且成為 AMCB 成功動員群眾的關鍵。此種組織方法始於初步的社會調查，並在調查過程中找到積極者成為聯絡人，接下來將聯絡人形成組織小組，再將數個組織小組轉化為籌備委員會，之後才是正式成立一個以捍衛移工和人民權益為目標的草根組織。這個組織過程是持續不斷的，而在每個組織階段都必須注意做到「喚醒」(arouse)、「組織」(organize) 和「動員」(mobilize)。(APMMF 2000；或參考吳佳臻 2008)

上述組織工作原則與方法出自「亞太菲律賓移工工作團」(亞太移工工作團的前身)針對組織移工製作出教育手冊，總結菲律賓組織者和移工幹部在亞洲及中東的經驗。²¹ 這本手冊起初被組織移工的菲律賓人士拿來當作一般參考指南，如今也提供給 AMCB 中其他國籍的移工組織成員。印尼移工協會也將手冊譯成印尼文，並依印尼移工狀況做些修改，成為印尼移工草根組織培訓的重要資源。

「按部就班的扎根組織工作」不必然是亞太移工工作團或其他菲律賓組織的招牌創見。然而，關鍵在於亞太移工工作團努力將組織工作的知識和技能傳授給之前缺乏這方面相關經驗的移工。透過系統化的

21 菲律賓移工的組織工作從 1980 年代開始進行，詳見 Bultron (2008)。

訓練課程，傳授組織工作原則與方法。而這些並非僵化的，菲律賓組織者總是強調具體的工作方法必須視現實狀況做調整。許多毫無經驗的移工在這些系統化的培訓與實作經驗後成為了組織者，並發展出具有創意的組織方法。例如，印尼移工協會就吸納了超過一百名積極會員，他們每個週末都前往各公園加入印尼移工的聚會。由於多數印尼移工無法享受例行性休假的權利，印尼移工協會就發展出「走動式諮詢」(mobile counseling)的創意組織模式。

我們採用走動式諮詢。我們已經訓練了20至25位的諮商員，進行工作的分攤，好確認我們可以定期找到會員，瞭解她們的需求，並且和她們討論如果遇到了麻煩該怎麼做。……現在我們擁有較多積極的會員，我們也希望能夠訓練他們成為經驗豐富的組織者，我們需要不斷培養新的組織者，因此我們決定分成四個小組，每個小組都在週末前往不同地區的公園和印尼人一同聚會，並且和他們做議題討論，如果有人無法休假，我們會透過手機聯繫，透過這些任務可以使更多人得到鍛鍊。(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一位積極成員說明她的任務：

我現在被分配到的地區是「橋下」，²² 那是印尼人在維多利亞公園的一處聚集地。我和其他負責這個區域的夥伴每個禮拜天都會去，問他們在做些什麼？討論他們遇到的麻煩和議題，遇到有活動的時候也會動員他們。(印尼移工協會會員)

強調扎根的組織方法是耗時而辛苦的，印尼移工協會會長Eni指證

22 假日印尼移工聚集的維多利亞公園旁有座高架橋，因可遮陽避雨，成為不少印尼移工聚會的地方。

歷歷：

草根組織有很細節，許多外人看來輕而易舉的事，我們都必須投入心力。例如，多數印尼女性移工在母國未完成中學，而在印尼的教育方式，除非是成績頂尖而且家裡有錢的學生，否則是不被鼓勵學習的，對女性尤其如此。所以許多印尼女性移工非常沒自信，甚至害怕學習。因此，我們各種教育訓練必須想盡各種有趣的方法突破學習障礙。我發現培訓者發的書面資料，大家並不會真的去看，因為怕看不懂，後來我想起小學時，老師常會叫大家朗讀，這是我們共同的童年記憶，於是我提議大家一起拿起資料，一人朗讀一段，有時還會在結束後來個關於資料內容的有獎徵答，結果效果很好，大家很開心、專心。……另外，開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不習慣書寫，因此沒有會議記錄，會後大家各憑記憶做事，造成不少紛爭，我們必須從基本的練習寫會議記錄開始，大家輪流寫，寫完大家一人一句朗讀……，就這樣，所有事情都從最基本的開始訓練。

儘管耗時而辛苦，菲律賓組織卻堅持紮實的草根組織路線，反映了他們的宗旨和信念，堅信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者是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這種社會運動的取徑直接挑戰了無政府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將社會運動視為自發或毫無組織性的觀點。

這種堅定強調草根組織工作的態度乃是在菲律賓累積多年經驗的結果。菲律賓群眾運動從多次草根組織發展遇到暗中破壞的經驗得到教訓。菲律賓農民運動（Peasant Movement of the Philippines，或Kilusang Magbubukid sa Pilipinas，簡稱KMP）提出了歷史回顧並且對菲律賓的NGO做出批判，凸出了從菲律賓人民運動經驗中的「NGO主義」（NGOism）所獲得的歷史教訓（KMP 1994）。分析指出NGO主義的幾

個問題，包括對於資助機構的忠誠勝過人民運動、從事社會經濟相關工作卻不關照階級鬥爭與社會結構改革的需求、官僚主義充斥、NGO服務趨向的腐化、專業主義，以及採取企業規則與標準並且各立山頭。藉由反省NGO主義的發展歷程與衍生出的問題，這些菲律賓進步團體再度肯認受剝削的群眾才應該是真正社會改革的主力。儘管NGO對於人民運動很重要，但關心受壓迫群眾的NGO應該把自己定義為「支援」群眾組織的一股力量，而不是自命為群眾的「代表」。

在此宗旨的引領下，菲律賓海外移工傳教會、香港外傭之家、亞太移工工作團，這些對發展移工草根組織和建立AMCB產生關鍵作用的NGO，很清楚地全身投入支持努力想望組織自己的移工，而非把自己當作救世主或者是移工的代言人。²³

儘管有支持草根移工組織的相關原則存在，有人還是認為由於NGO擁有較豐富資源，例如全職工作人員、代表發言的表達技巧、資金與教育資源、固定的辦公場所、跨國連結等等，因此仍然能夠實質掌控日常生活的運作機制。為了縮短上述NGO和草根組織之間的客觀差距，菲律賓移工傳教會、香港外傭中心和亞太移工工作團所形成的鐵三角做了以下的努力。首先，讓草根移工組織也能獲取NGO的資源，比如分享辦公的空間和設備。再者，由這三個機構提供系統性的教育訓練，協助草根移工組織發展自我表達的技巧與文字能力(用來募款、發表聲明等等)，以及其他組織管理的技巧。第三，NGO協助從移工母國來的組織者到香港工作以協助香港的草根移工組織；如此一來不僅能夠促進草根移工組織的發展，也能強化該組織與母國內運動的連結。第四，為了保證草根移工組織的訴求都能夠受到重視，這些NGO在組織規章中明訂草根移工組織的代表參與決策機制。例如，

23 並非所有的菲律賓運動組織都堅持這樣的信念，群眾路線和NGO路線的團體在1990年代初期有劇烈的爭論和分裂，移工運動的路線也受此爭論影響，本文提及的組織為堅持草根組織路線的菲律賓團體。

菲律賓團結聯盟和「移工國際」(Migrante-International)的主席都參加了亞太移工工作團的理事會，而菲律賓團結聯盟的代表也是菲律賓移工傳教會的理事會成員。

(三)與母國的運動連結

雖然AMCB抗議目標經常是香港政府，但相當重視協助移工瞭解母國政治經濟問題才是迫使他們到海外工作的根源，因此他們也應投注心力發展與強化母國國內的人民抗爭。

作為草根移工運動先鋒的菲律賓移工組織的力量便與母國人民的運動緊密關連，必須要放到更大的菲律賓群眾運動的脈絡下方能徹底瞭解。協助成立AMCB的四個菲律賓團體都是菲律賓進步群眾運動的一環。菲律賓團結聯盟和許多其他菲律賓草根移工組織一樣，是菲律賓移工國際(Migrante-International，菲律賓在世界各國移工草根組織的國際性聯盟)的成員組織，而移工國際是菲律賓多重部門群眾組織(multi-sectoral mass organizations)的全國性聯盟「新愛國陣線」(BAYAN)的會員組織。新愛國陣線的會員組織包含了許多不同部門的草根運動組織所組合的聯盟。²⁴而最早到香港開拓移工組織的菲律賓移工傳教會和亞太移工工作團的組織者都是曾是反馬可仕的人民運動的積極成員。²⁵

移工國際於1996年正式成立，在新愛國陣線代表移工部門。他們堅信若要解決不斷流移海外的菲律賓移工潮，就必須獲得國家真正的自由民主以解決菲律賓人民的基本問題。正因為如此，移工國際和其他新愛國陣線的聯盟組織團結在一起(Bultron 2008)。

由於菲律賓群眾運動之強大而全面性，許多菲律賓移工在成為移工之前就擁有些許的組織經驗。這種經驗對於海外移工運動的形成很

24 詳見 <http://www.bayan.ph/site/>

25 菲律賓移工運動與菲律賓整體社會運動的關連與歷史，將另有文章分析。

有貢獻。例如，菲律賓團結聯盟的主席 Deloris 在菲律賓曾參與學生運動，在擔任外籍家庭傭工九個月之後，她開始積極加入菲律賓移工組織。先前的運動經驗使她已經瞭解菲律賓的基本問題與組織菲律賓人的方法，而這些經驗使她在香港能更成熟地著手組織工作。

菲律賓組織激勵並且鼓舞了來自其他國家的移工去檢視自己被迫遷移的根源，並且與母國的組織和運動結合在一起。與母國之間的連結不僅能夠協助移工組織拓展抗爭的視野，也能幫助母國的組織更加瞭解在海外的移工議題。泰國區域聯盟的主席就很驕傲地說：「我們的組織是泰國第一個海外勞工組織」。

移工組織與其母國國內的社會運動透過各種交流而形成連結。泰國工會和勞工 NGO 前往香港對泰國移工進行教育訓練或發表演說。泰國區域聯盟則透過通訊刊物和廣播節目來讓移工和泰國本國的人民更加瞭解彼此關注的議題。印尼移工協會亦和印尼本地的組織發展出合作關係，藉由將國內的組織幹部送到香港，或利用印尼移工協會幹部回國的時候進行組織訓練。當印尼移工協會的幹部回印尼時，也讓國內人士更清楚移工在香港以及其他國家工作時所關切的議題。這樣的經驗對年輕而缺乏組織經驗的印尼移工來說尤其獨特。因為印尼移工協會和 AMCB 的關係，印尼移工協會的幹部不只涉入了香港的移工運動，同時也與母國國內的運動發生關聯。²⁶

由於視野的拓展，AMCB 的移工們意識到在香港、印尼以及其他國家建立更強而有力的運動是多麼重要。印尼移工協會的幹部已經協助組織在澳門工作的印尼移工。有些積極的印尼移工協會會員回到印尼持續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反調漲油價的各種抗議活動。而當那些反對調漲油價的示威者在雅加達被警方逮捕時，在香港的印尼移工協會

26 2013年十二月於印尼巴厘島舉行WTO第九屆部長會議時，由印尼人民聯盟（Indonesia People Alliance，IPA）主辦的反世貿活動——People's Global Camp（PGC）中，印尼移工協會的幹部便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動員集結於香港的印尼領事館前，要求立刻釋放示威者。此外，一些結束香港工作的印尼移工協會的幹部返國後於雅加達成立ATKI-Jakarta，繼續移工議題的推動與組織工作，有些則回到家鄉，就近參與了農民組織。

Law (2002)於探討跨國行動主義的文章中強調，AMCB跨國行動成功地形塑了一個新的外籍家傭主體，拋開了具體的國家爭論(national debates)。她認為AMCB為菲律賓社會運動轉移了爭論，因為菲律賓女性主義國族主義運動無法再將女性移工主體看成是依附於新殖民政府政策。Law又更進一步指出：

對菲律賓組織來說，全球性社會運動可以幫忙支持他們關心的國家議題，但因此可能會危及AMCB的穩定性，因為國家政治在勞動力遷移中具重要性。

然而，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Law的分析和預言似乎出現錯誤。首先，AMCB的形成並未拋開具體的國家爭論，因為移工組織和其會員持續把更廣泛的移工議題和國家議題做結合。第二，AMCB並未因支持菲律賓國內的議題而受到危害。相反地，AMCB因菲律賓組織鼓勵其他國家的組織結合其母國國內的抗爭行動而更加壯大。

(四)菲律賓組織者的謙讓

菲律賓組織者的謙虛態度也是讓他們可以和其他國籍人士一同合作的重要因素。菲律賓移工傳教會的主任強調：「組織其他國籍人士的關鍵就在於要從他們的文化與歷史中進行學習。」一起舉辦活動時，菲律賓組織者刻意扮演低調角色以鼓勵其他國籍人士更積極地參與。

菲律賓人通常被當作「專家」，但我們總是徹底解釋說明讓其他國

籍人士也能完全瞭解議題，然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在集會遊行的時候，泰國和印尼組織都是排在前面。他們的文化比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們也非常有創意。菲律賓人通常在後面。(菲律賓團結聯盟主席)

其他國籍的移工則非常感謝菲律賓組織者的謙虛態度。

儘管菲律賓人已經做出較多的成果，但他們不會佔便宜。印尼人非常感謝菲律賓人。遊行的時候，菲律賓人都走在最後，因此印尼人和其他國籍的人士可以走在前面，像這樣簡單的事就足以讓印尼人感謝菲律賓人。(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印尼移工協會主席於2008年當選為國際移民／工聯盟(IMA)第一任主席的事實，也是菲律賓組織者謙卑的例證。菲律賓草根移工組織一向被視為較「先進」，而菲律賓人也是國際移民／工聯盟最主要的催生者。移工國際或菲律賓團結聯盟的主席理應能夠被推選為國際移民／工聯盟的第一任主席。然而，為了鼓勵其他國籍人士，菲律賓籍組織者推選印尼移工協會的主席為國際移民／工聯盟的主席。

七、亞洲移工協調會草根跨國主義的啟示

AMCB的領導與組織者在締造這麼多成就的過程中，同時也面臨挑戰，包括語言的隔閡、時間上的壓力、資源有限、會員間不同程度的政治運作能力與組織經驗，以及拓展與鞏固組織工作的需求。儘管如此，AMCB依舊繼續茁壯，提供經驗見證「由下而上的跨國主義」，鼓舞了全世界的草根移工組織。

AMCB移工的轉化可以由杜漢(Alain Touraine)所說的由個人主體

轉變到歷史主體的概念總結(Touraine 1988)。杜漢提出「社會性運動」(societal movement)的概念,「歷史質」(historicity)與「主體」(subject)則是其中兩個關鍵元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夏曉鵬 2006),除了「個人主體」(personal subject)和「歷史主體」(historical subject)之外,在主體化的過程中,必須經由集體意識的發展而創造出「社群主體」(communal subject)。透過菲律賓移工傳教會和香港外傭之家所提供的提問法,移工逐漸瞭解了他們自身的處境並非肇因於命運,而是一種被迫流離遷徙的結果,而他們可以做一些事來改善目前生活,這就是移工發展出的個人主體。而藉由和其他移工連結,首先連結自己的同胞,再連結其他國籍移工,移工們進一步發展出社群主體,看見移工的集體力量。透過連結母國國內的運動,從而連結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全球性運動,AMCB的移工已經發展出歷史主體,藉由重塑建立自我認同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模式而創造歷史。

AMCB如此鼓舞人心的發展經驗提供了關於跨國主義的一些啟發。首先,移工是有可能藉由與其他國籍人士共同合作來打敗「分而治之」的統治者技倆。第二,和無政府主義者、後現代理論家與行動家看法完全相反地,這種草根跨國主義並非隨意或自動產生,它需要持續不斷一步一步忍受煎熬付出努力。

第三,NGO能對草根移工組織發展有重要的協助,但有志者必須從「代言角色」轉化成為「支援角色」。握有較豐富資源的NGO可以提供草工組織各種支援,包括分享草根移工組織迫切需要的物質資源、提供草根移工組織系統性的培訓、從母國派出組織者到移居地和草根移工組織一起工作,以及確保草根移工組織的代表參與NGO的決策機制。

第四,為發展堅實的草根跨國主義,和不同國籍移工分別進行紮實的組織工作是必要的,這可幫助克服語言文化隔閡以及對不同國家背景知識缺乏所造成的困難。此外,組織工作的知識必須建立於實踐

經驗的累積；因此，協助其他國籍移工組織之前，必須親身經歷紮實的組織經驗。如同亞太移工工作團執行長所言：

如果沒有我們組織自己同胞(菲律賓人)的經驗，我們就無法把這些在實際操作上已經證明非常有用的方法，拿來和其他國籍的移工分享。

第五，為突破語言隔閡，善用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將議題融入戲劇、舞蹈、音樂等文化展演中，是建立跨國連結初期時非常有效的方法。第六，必須確認形成草根組織聯盟的共識。為了打造團結的基礎，不同國籍人士之間的文化、經驗和議題分享都是最基本的。對不同國籍的移工來說，那些在移入國所遭遇的議題是團結合作的必要因素。

第七，結合母國國內的抗爭運動可強化移工組織的力量，因為他們如此就更能面對被迫流離遷徙的根源，進而提出訴求。第八，針對移入國政府抗議對移工而言是有高風險的，因為他們很可能被遣送出境。組織者對於鼓吹移工反對移入國政府的行動必須非常謹慎，避免讓草根移工組織的領導人和積極的會員陷入被遣返的危險。

總而言之，如同著名的移工權益倡議者 Irene Fernandez 博士在國際移民／工聯盟成立大會上的主題演說所下的結論：「在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下，移工必須進行雙重的鬥爭：同時針對母國和移入國。」AMCB 已經以實踐證明，為了保護移工並發展真正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跨國草根移工運動，這種兩面作戰是絕對必要的。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吳佳臻。2008。《天生愛組織？菲律賓移工自主團體在台灣的組織經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香港入境事務處。2010。《入境事務處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報告》。網址 http://www.immd.gov.hk/publications/a_report_09-10/chi/ch1/index.htm#b5_5 (瀏覽日期：2013.4.14)
- 香港統計處。2011。《2011 人口普查》。網址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main-table/A104.html> (瀏覽日期：2013.4.14)
- 亞太移工工作團。2002。〈菲律賓移駐勞工在臺灣的處境〉。夏曉鵬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8：219-234。
- 夏曉鵬。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1：1-71。
- 羅永生。2007。《香港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Ramon Bultron。2008。〈移工運動的奮鬥與發展：菲律賓經驗〉。《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下)》，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編，頁161-175。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西文部分

- AMCB et al. 2006. *Submission from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CEDAW Shadow Report 2006*.
- Aning, J. 2011. HK's foreign maids get \$160 pay hik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網址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2873/hk%E2%80%99s-foreign-maids-get-160-pay-hike> (瀏覽日期：2013.4.14)
-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 2003. *Evaluation report: Asian migrant coordinating body*. Hong Kong: APMM.
- . 2005. *News digest: Monthly newsletter for the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 November-December.
-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 Filipinos (APMMF). 2000. *A brief guide in organizing migrants*. Hong Kong: APMMF.
- Brecher, J., Costello, T., and Smith, B. 2000.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 Cheng, Shu-Ju Ada. 2003. Rethink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domestic service: Foreign domestic, state control,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aiwan. *Gender and Society*, 17 (2), 166-186.
- . 2004. Right to mothering: Motherhood as a transborder concer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 6 (1), 135-144.
- Constable, N. 1997. *Maids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New York: Cornell

- University Press.
- 2007. *Maids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2nd 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9.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ny states of protes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1 (41), 143-164.
- 2010. Migrant workers at the many states of protest in Hong Kong. In Nicole Constable (Ed.), *Migrant workers in Asia: Distant divides, intimate connections*, 127-14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Evans, P. 2000. 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1), 230-241.
- Ford, M. 2004. Organizing the unorganizable: Unions, NGOs, and Indonesian migrant labou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 (5), 99-119.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97.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Hong Kong Yearbook 1997*, Hong Kong.
- . 2001.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01*, Hong Kong.
- . 2002.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02*, Hong Kong.
- . 2003.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 . 2004.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 . 2004. *Entry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Hong Kong.
- . 2005.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 . 2011. Imported workers. *Hong Kong Yearbook 2011*, Hong Kong.
- Ho, Denny Kwok Leung. 2000.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ty mobilization: The housing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Stephen Wing Kai and Tai Lok Lui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pp. 185-20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 (KMP). 1994. Development divergence: Reformism in the Philippine NGO Community. *Peasant Update Philippines*, September, 3-7, 14-15.
- Lan, Pei-Chia. 2003. Political and social geography of marginal insider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 (1/2), 99-125.
- Law, L. 2002. Site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Filipin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In Brenda S. A. Yeoh, Peggy Teo and Shirlena Huang (Eds.), *Gender Politic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 205-22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yons, Lenore. 2009. Transcending the border: Transnational imperatives in Singapore's migrant worker rights movemen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 (1), 89-112.
-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 S.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ras, J. 1999. NGOs: In the service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9 (4),

429-40.

- Porta, D & Tarrow, S. 2004.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People, passions. In Alan F. Blackwell & David MacKay (Eds.),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2000.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In Don Kalb (Eds.), *The ends of globalization: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pp.253-7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Rodriguez, R. M. 2010. On the question of expertis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civil society' processes. In Aziz Choudry and Dip Kapoor (Eds.), *Learning from the ground up: Glob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pp.53-6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im, A. 2003a. Organizing discontent: NGOs for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1 (3), 478-510.
- 2003b. The cultural logic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19-22, August 2003, Singapore.
- Smith, M.P. 1994. Can you imagin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s. *Social Text*, 39, 15-33.
- Tierney, R. 2002. Foreign workers and capitalist class relations in Taiwan: A study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isolation. *Bulletin of Labor Research, Cheng-Chi University*, 12, 125-165.
- Touraine, A.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